

古玺读本

萧毅 编著

凤凰出版社

古
文
字
读
本

古玺读本

萧毅
编著

 凤凰出版社

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玺读本 / 萧毅编著. 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
2017.6
ISBN 978-7-5506-2605-8

I. ①古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古印(考古)—研究—
中国 IV. ①K87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7939号

书 名	古玺读本
编 著	萧 毅
策 划 编 辑	李艳丽
责 任 编 辑	樊 昕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bbs.com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,邮编:210038
开 本	652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22.5
字 数	335千字
版 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605-8
定 价	98.00元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25-68037410)

弁 言

汉字乃中华文化之载体,《古文字读本》(四册)则是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汉字的入门佳作。该书提纲挈领,深入浅出,最适合初学者循序渐进,步入佳境。读者倘能藉此以为治学之阶梯,便可登堂入室,进而窥探中华文化之堂奥,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值此全书付梓之际,爰缀数语志贺。

丙申孟冬

有恒通

凡 例

1. 全书简体,必要时用繁体。
2. 正文包括图版、著录、释文、注释、延伸阅读等项。
3. 图版,一般甲骨文用照片和拓片,金文用器物照片和拓片,简牍用照片,古玺主要用印钮,印面照片和印拓。
4. 著录只选一两种常见的。
5. 释文一般宽式,假借字用括号标出。
6. 注释从简,有定论的直接用定论,没有定论的用“一说”“有人认为”等列出一两种解释。限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,引用他人成果不一一标明,详见后面的参考文献。
7. 关于器物出土、收藏、断代、分域等放在注释[1]中说明。
8. 延伸阅读部分知识性和可读性结合,主要是文字学基本知识的融入,也有适当的背景介绍或发散故事。
9. 本书引用《古玺汇编》较多,为节省篇幅,一律略去书名,只标明在原书中的编号。如“0168”指《古玺汇编》0168号玺。

前 言

研究古玺,不能不提“玺”字。关于“玺”字的本义,有不同的看法。如《说文解字·土部》:“玺,王者印也。所以主土,从土尔声。玺,籀文从玉。”又《尔雅·释名》:“玺,徙也。封物使转徙而不可发也。”《说文》所言,不过是秦以后的史实,《尔雅》也只是说出了玺印的某种职能。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用民》:“故民之于上也,若玺之于涂也。抑之以方则方,抑之以圜则圜。”马国权受此启发,认为玺字作“尔”,上端是玺的钮或柄的侧面之形,下边是按捺之后呈现出来的纹样,其后或从土,或从金,则是说明玺本身的质料。此说已经为多数学者接受。

一般认为,古玺是指秦以前的玺印,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,而古玺的上限,即古玺起源于何时,历来却争议颇大,近些年来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促进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,现在有较多学者认同三方商玺的可靠性。

目前传世的古玺大多是战国时期的遗物,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、经济交往的信物以及祈祥厌胜的佩饰,对研究当时的历史、文字以及古代艺术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古玺文字内容丰富,诸如姓名、地名、官名、成语等,为研究古代官制、地理沿革、先秦姓氏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,古玺文字不但可以证史,而且能够补佚,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

罗振玉曾论及古玺印有裨于考证:“玺印有裨于考证至巨。即就此编所载者言之,古玺印皆记姓名,汉人始有封完及吉语诸印,此前人所习知者,然征之古玺,已有取成语为印者,如编中所载,曰富、曰得志、曰右生(右即佑)、曰安官、曰敬事、曰敬上、曰上明(上即尚),审其书体,皆在秦前;又汉人或铸物象印,其所绘人物与汉石刻画像同,前人称为古蜡封印,

不能断定时代，今乃确知为汉物。据此，知周代有成语印、汉人有物象印，此有裨考证者一也。两汉以来，官印可补正官制讹阙者，多不胜数。此编有廿八日骑舍印，于前籍无证，当为传舍之印，往见汉木简，知塞上亭隧受书发书皆纪日时，此印盖亦为传舍纪日之用；予又尝见汉官印，文曰：执法道二十二，殆汉御史亦分曹当直，此均可补史志阙文，有裨于考证者二也。《汉志》胶东国有挺县，高氏《齐鲁古印攷》有挺县左执奸，挺字从木旁作，此录有挺中二字半印，亦出齐地，殆东汉废挺县改为乡之名，字亦作挺，与高氏藏印正同，足证史志从手作之讹，此有裨考证者三也。古玺文字虽多难晓，然如人姓之长、之王，可确知其不误，后世无长姓，《孟子》则有长息，又此编汉人印中有伤禁、伤□，吴清卿中丞藏印有伤咸，伤姓亦不见古姓氏书，然唐有汤府君妻伤氏，墓志称受氏于伤琳，得姓于汤武。古刻记族望所由来多不可信，然得知唐初尚有伤姓，足为诸印之证，此有裨于考证者四也。六朝石刻书触字作𠂔，从牛角，初谓是当时别构，今观小玺中实有是字，其义虽不可知，而从牛角则同，知先秦以前已有之，可补字书之阙，此有裨于考证者五也……”

裘锡圭说“战国、秦汉的玺印文字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从印文内容看，它们提供了官制、历史地理、社会经济和思想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资料。不少资料可用来补充流传古文献的阙漏或订正其错误。……从文字学的角度看，战国、秦汉玺印文字的重要性更为突出。已发现的战国古玺数量相当多，玺文中不重复的单字数大概比同时代铜器铭文中的还要多，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是一批极为重要的资料”。

官玺是战国时代官吏任职和行使权力的信物。战国时代官僚机构已相当庞杂，而现存古籍对于这个相当庞杂的系统的记载又过于简略，许多详细情况不得而知，而官玺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。楚国官制，传世文献语焉不详，黄锡全在《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》一文中对楚玺以及其他古文字材料中出现的官府名、官名百余条详加考证，其中包括 14 个府、16 个宫室机构和 80 多个职务，是恢复楚国官府机构、职官制度的一块基石，这对研究楚史、楚文化无疑是一大贡献。

古玺中的许多地名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，李学勤《〈古玺通论〉序》谓“古玺所见当时地名甚多，有一部分为文献所未载，或据出土所在，

或据玺本身形制、字体、格式的特点，或据后世地名推溯，能够考定其国别位置，这当然是很重要的”。

古代文献是历代传抄下来的，在历时漫长的岁月中，传抄难免会出现错漏，据玺文可校正史籍中的讹误。如李家浩在《楚国官印考释（四篇）》一文中对楚玺“五渚正玺”的考释，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五湖、五都等皆为“五渚”之误，这样便使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等处的记载错误得以改正。

古玺文字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，战国文字上承春秋金文，下启秦汉篆隶，是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时期，而古玺文字则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变化规律诸如简化、繁化、异化、同化等提供了大量实证。此外，由于地域的差异，古玺带有较为浓郁的地域色彩，各国文字也存在较大差别，这样，一方面可通过古玺形制的不同来认识各国文字，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各国文字的认识来确定古玺的国别。文字和形制的互证为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识。比如楚文字中作“𠄎”形的金旁，不同于他国，这样，金旁作此形的古文字资料可定为楚系文字资料。

古玺是篆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，是学习和研究篆刻的重要资源。早在人们认识古玺以前就取法古玺进行篆刻创作，只是还没有意识到取法的是古玺。在人们认识古玺以后，更是有意识的取法。

古玺文字的研究可以粗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为晚清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。主要包括著录、考释、字形研究、铭辞研究、分域研究、综合研究等方面。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，挂一漏万，在所难免，敬请谅解。

第一阶段突出的成果是古玺时代的确定以及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著录。

古玺印的著录虽早在宋代，但直至晚清人们才明确古玺的时代。乾隆时，程瑶田《〈看篆楼印谱〉序》中提及“私玺”，道光时，徐同柏为张廷济编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，举出“古文印”类，至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吴式芬《双虞壶斋印存》才正式标出“古玺”类，并分出“古玺官印”“古朱文印”，列在秦印、汉印前，这可以说是古玺研究的开端。

陈介祺曾提及“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，玉印似六国书法，近两周者”

(《簠斋尺牍》第五册),但正如罗福颐所言,“清末,学者对战国古玺文字之时代多慎重,只称之为古玺,陈簠斋亦作游移之辞,说似六国文字”。而王国维则首先肯定古玺文字是六国文字,在《〈桐乡徐氏印谱〉序》中,王国维根据罗福颐《古玺文字征》稿本中的一些古玺文字与正始石经古文、《说文解字》古文以及出土战国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,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。王国维还相当重视古玺文字,认为“然则兵器、陶器、玺印、货币四者,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,尤为重要,实与甲骨、彝器同”。

著录玺印已有悠久的历史。

《旧唐书》载有韦述的“玺谱之类”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录有纪僧夏《玉玺谱》等,宋代也有专收玺印的书,如杨克一《集古印格》等,更有官修《宣和印谱》,此外,宋代其他一些金石著录中也著录了一些古玺印,如王俅《啸堂集古录》等,元代以降,谱录渐多。较早的印谱,多已不传,现存可信的,以明隆庆五年(1571)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为最早。此后印谱数量大增,尤其到了清代,除数量外,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,这与乾嘉考据之风以及文人篆刻的普及密切相关。到晚清,开始出现收录古玺的专书,如吴大澄《千玺斋古玺选》。有些印谱如陈介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虽然兼收汉以下印,但其中收有许多古玺,是研究古玺不可或缺的材料。这一阶段多注重玺印上的文字,而忽视玺印的形制,因此只录印拓者多,兼录钮制和质地者少。

清末,一些古文字著录开始收录古玺文字。光绪九年(1883),吴大澄《说文古籀补》正编所收的1400余字中,古玺文字就有570多个,代表了当时研究古玺文字的水平。其后,1925年丁佛言《说文古籀补补》、1935年强运开《说文古籀三补》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古玺文字。第一部收录古玺文字的专书,是1930年罗福颐编纂的《古玺文字征》,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,附录约650个,是对此前半个世纪以来古玺文字研究成果的总结,这标志着学者们已把古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。

关于古玺的文辞,最先识出战国官玺的是王懿荣,光绪七年(1881),其为高庆龄作《〈齐鲁古印攷〉序》中称:“玺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际,如司徒、司马、司工、司成之属,半皆周官。”1915年,罗振玉在《〈赫连泉馆古印存〉序》中提出“古玺中有成语印”,次年在《〈赫连泉馆古印续存〉序》中

进一步确定。

这期间,还出现了通论性的著作。如陈邦福《古玺发微》分为类别、玺式、钮式、辨质、馀说等几个部分,虽然简短,但较全面。王献唐《五灯精舍印话》虽不系统,但其内容相当广泛,形制、文字、出土情况等各方面多有涉及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较早出现的考释古玺印的专书有黄质的《宾虹草堂玺印释文》,原收于《宾虹草堂玺印释文》中的古玺印有 700 多方,吴朴堂选取其中的 239 方,其中有些玺文的释读甚为精当,如“庆忌”“范寿”等,手稿现藏浙江省博物馆,1995 年,曹锦炎选取其中较为重要者编为《黄宾虹古玺印释文选》。影响较大的考释论文有朱德熙、裘锡圭合写的《战国文字研究(六种)》和《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》,前者考释“遽驷”,后者论证战国时代的“官”多省去辶旁,并考释了古玺中的“官”字及从官的一些字。

1959 年,李学勤《战国题铭概述》在《文物》杂志上连载发表,虽然这并不是一篇专门讨论古玺的文章,却在古玺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除对古玺文字进行比较归纳、介绍一些重要的传世古玺外,第一次论及古玺的地域性。

1978 年,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,朱德熙《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的“者”字》释出古玺中的“者”和“都”字。

总的来说,这一阶段以材料的积累为主,古玺文字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,古玺文字的研究逐渐繁盛起来,尤其是在 1981 年罗福颐主编的《古玺汇编》《古玺文编》两书出版以后,古玺研究空前发展,研究的范围广,程度深,较为注重实物与文献的合证,而且专题越来越细致,如专门研究一个字的地域特征,对成语玺的研究,对合文的研究等,古玺研究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分支学科。就古文字方面看,许多学者运用古玺文字作为突破口来释读古文字;而在其他方面,也有许多学者利用古玺文字来研究古代的职官制度、郡县的设置等。

1. 著录

1981 年,罗福颐主编的《古玺汇编》和《古玺文编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《古玺汇编》收录古玺 5708 方,并附有释文。该书的刊出为古玺文字

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,对古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白玉微瑕,该书在释文和编排上略有可商之处,学者们多有订正。1983年吴振武《〈古玺汇编〉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》对《古玺汇编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作了修订。此后,尚有施谢捷《〈古玺汇编〉释文校订》。

另一部较为重要的印谱,是康殷、任兆凤主辑的《印典》,除收录秦汉以下印章外,还收有大量古玺,按字编排,并附有检字表,甚为便利。

《古玺汇编》和《印典》两书所收古玺较多,尤其是官玺,大体已备,所遗者以私玺居多。

辑录新出玺印较为重要的,有周晓陆主编的《二十世纪出土古玺印集成》。

其他新出的较为重要的玺印谱录有《上海博物馆藏印选》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》《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》《新出历代玺印集录》《故宫历代铜印特展图录》《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》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一》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》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二》《中国历代玺印艺术》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·玺印》《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·方寸乾坤》等。

近些年来,有些私人藏印也陆续整理出版,如《战国古玺印最》《珍斋藏印·战国篇》《鉴印山房藏古玺印菁华》《中国古印——程训义古玺印集存》《铁斋藏古玺印》《金印玉玺——古代官印私章精品鉴赏》《盛世玺印录》《甘露堂藏战国箴言玺》等。

2. 综论

综论性的专著有林素清《先秦古玺文字研究》、马国权《古玺文字初探》、罗福颐《古玺印概论》、曹锦炎《古玺通论》等。

《先秦古玺文字研究》概说部分讨论玺印的起源、使用方法、著录与研究,随后研究了古玺文字的省变与美化以及“=”符,并辨认了一些古玺文字,文后附有《古玺印谱汇目》。

《古玺文字初探》主要包括古玺的产生及其类别、古玺文字的样式和体势、古玺文字结构、古玺文字与其他古文字等几个部分,颇多创见。

《古玺印概论》把1963年由其与王人联合著的《印章概述》一书的内容吸收融化,并有新的发明。全书共分十四章,分别介绍了历代印玺的书

体名称、钮制、物质、类别、由来、时代考证等,是有关玺印的一部重要的专著,书中不乏独到见解,可惜稍嫌简略。

《古玺通论》是对古玺较为全面的研究,全书分上、下两编,上编具有通论性质,涉及古玺的时代、对古玺的认识和研究、形制和分类以及古玺文字的构形特色和地域特色等,下编具各论性质,将官玺分楚、齐、燕、三晋、秦等五系考述。

王献唐《五灯精舍印话》1985年整理出版,涉及面广,诸如出土、清理、鉴藏、著录、形制、释读等等,多有论述。

萧毅2002年完成博士论文《古玺文字研究》,主要包括古玺文字形体研究、语辞研究、考释等内容,详细分析了古玺文字的地域差异,对古玺的自名以及古玺中的职官、姓氏、成语等作了初步的分域整理,并释读了一些古玺文字。

2005年,肖晓晖《古玺文新鉴》虽然篇幅不长,但书中对玺印的起源、功用、形制、释读以及古玺文字的构形等有很好的论述。

此外,一些著述虽非专论古玺,但涉及较多古玺或古玺文字。如李学勤《东周与秦代文明》,高明《中国古文字学通论》,陈炜湛、唐钰明《古文字学纲要》,陈世辉、汤馥惠《古文字学概要》,何琳仪《战国文字通论》等,其中1989年出版的《战国文字通论》在讨论各系文字时,立有专门小节研究古玺形制、文字、铭辞等方面的特点,且能与各系其他文字相比较,为此后古玺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
3. 考释

古玺的考释仍是重点,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仅仅是考释文字,而是有意识地结合历史文献等,较为深入。

1981年,罗福颐主编的《古玺文编》出版,该书正编按《说文解字》顺序收录玺文1434字,合文31例,附录1305字。该书是对前人考释古玺文字成果的总结,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古玺文字的水平。对该书校补的论著有吴振武《〈古玺文编〉补正》等。其中《〈古玺文编〉校订》除在释文方面发明较多外,在古玺文字的地域特点等方面亦多有创获。

1981年,于豪亮《古玺考释》考释“长坪君相室玺”“陉城发弩”等五方古玺。

1983年,黄盛璋《“匈奴相邦”印之国别、年代及相关问题》指出“匈奴相邦”玉玺是三晋的官玺。朱德熙《古文字考释四篇》考释古玺中的“犛”以及“椋”和“受”字。曹锦炎《释犛》考释古玺中的“犛”以及一系列从犛声的字。裘锡圭《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》,考释出古玺中的“𠄎”“脂”等字以及一系列相关字。

1985年,曹锦炎《战国玺印文字考释(三篇)》考释古玺中的“襄”字和合文“五鹿”等。

1986年,王辉《古玺释文二则》释出合文“君子”。

1989年,吴振武《古玺合文考》考释了古玺中的“中阳”“弋阳”等18个合文。

1990年,裘锡圭在《“诸侯之旅”等印考释》一文中,考释了见于《安昌里馆玺存》和《续衡斋藏印》中的三方与“旅”有关的楚国官印。

1991年,吴振武《战国玺印中的“虞”和“衡鹿”》考释了燕国的“左吴”玺和楚国的“行录”玺。

1992年,何琳仪写于1988年的《古玺杂识续》发表,文章考释了“阴”“豫”“京”等字。同年李家浩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上提交《战国官印考释(六篇)》,多有创获。

1993年,汤馥惠《“卑将匠𠄎信玺”跋》认为“卑酱”当读作“裨将”。同年出版的《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》收有汤馥惠《古玺文字七释》、曹锦炎《战国古玺考释(三篇)》等论文。

1995年,施谢捷《古玺印考释五篇》考释了“区相夫玺”“长相如”等印。

1996年,高明《说“𠄎”及其相关问题》考释齐国陶文玺印常出现的“𠄎”,疑即文献中的“照”字,当是代表官府检验合格的凭证,此外,作者还论述了—直未有定论的“𠄎”字。李家浩《战国官印考释两篇》释出三晋官玺“千亩左库”,并考释了楚玺“大厩”。吴振武《战国官玺释解两篇》中“鱼玺”之释确不可易。施谢捷《古玺印文字考释五篇》,释出“欧牛”“龙文”“九侯”等,另一篇《古玺印考释十篇》考释了古玺中的“终古”“鲁人”“非字”“孟子”等。

1997年,王人聪《战国吉语、箴言玺考释》对一些文字易识但文义难

明的成语玺作了解释。

1998年,吴振武《古玺姓氏考(复姓十五篇)》考释出“马矢”“大叔”等复姓,同年作者还发表《释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官印》。施谢捷《古玺印文字丛考(十篇)》释出合文“白牛”“四水”等。此外,还有刘钊《玺印文字释丛(二)》、徐在国《“信士”玺跋》、《古玺文字八释》等论文,各有所得。何琳仪《战国古文字典》虽然不是古玺文字的专门字典,但是该书涉及大量古玺文字,是研究古玺文字必备的参考书。

1999年,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文字研究》(第一辑)收有多篇有关古玺的论文,其中吴振武《战国玺印中所见的监官》对旧释为“丞”的字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;施谢捷《古玺双名杂考(十则)》考释了“不脂”“巨梁”等人名;徐在国《战国成语玺考释四则》释出“千金”“亲寿”“善人”等成语;此外,还有刘乐贤《古玺汉印复姓合证三则》、吴良宝《玺陶文字零释(三则)》等文。同年尚有施谢捷《古玺印文字考释(十篇)》、白於蓝《古玺印文字考释(四篇)》、徐在国《战国官玺考释三则》以及魏宜辉、申宪合写的《古玺文字考释(十则)》等论文,多有所得。

2000年,施谢捷《古玺复姓杂考(六则)》考释出“公户”“在丘”等复姓。萧毅《“麋亡”印释》认为“麋亡”印为成语印。

2001年,李学勤《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》考释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,认为“抑埴”与“之玺”相当。

2002年,李家浩《战国官印“尚路玺”考释》认为齐玺“尚路”当是《周礼》“典路”的异名。同年徐在国《古玺文字释读九则》释出玺文“不廷”“马尸”等。

2006年,施谢捷博士论文《古玺汇考》在分类、分域的基础上对古玺作有全面的整理释读,文末附有辑集古玺印印谱知见目录、有关古玺印研究论著目录等,可惜提交答辩的只是部分内容。赵平安《释行木》认为旧释“桁”的字应该是“行木”两字,并认为楚玺“衡鹿”作“行豪”,“行豪”即“衡鹿”,“行鹿”就是行林木,结构和意义同“行木”相仿佛。

2007年,陈剑《说慎》考释了古文字中的“慎”字,涉及较多古玺。

2008年,田炜在其博士论文《古玺探研》中考证了部分官玺、私玺以及古玺字词。修改后于2010年出版。

2010年,施谢捷《说“𠄎(𠄎𠄎)”及相关诸字(上)》涉及较多古玺文字的释读。

2011年,刘钊《古玺格言玺考释一则》考释了新出三晋成语玺“昼夕敬事”。马楠《清华简第一册补释》认为古玺中释为“閒”的字可读为“县”。刘洪涛《战国官印考释两篇》认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方两合玺为“虞”,“读为‘虞’,是掌管山泽之官”。文章还讨论了《古玺汇编》0198的释读。

2012年,刘钊《关于几组战国格言玺的解释》考释了“中青”“白中”等古玺。

2013年,赵平安《“京”、“亭”考辨》涉及《古玺汇编》0279、0225等古玺。

2014年,李家浩《战国官印“车御令信”考释》认为“‘车御令’当是‘戎车御’、‘任车御’、‘游车御’之长,疑即《周礼·春官》中‘车仆’之别名”。

4. 分域

这一阶段较早涉及古玺分域问题的有黄盛璋《所谓“夏虚都”三玺与夏都问题》一文。

1980年,裘锡圭《战国文字中的“市”》一文把齐、燕、三晋和楚国文字里关于市的资料分别加以考释,识别出以上诸国“市”字的不同形体,为古玺文字的分域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。

1981年,叶其峰《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》一文根据地名、官名、形制、字体等标准判定国别。

1984年,吴振武《战国“𠄎(廩)”字考察》对战国文字中的“廩”字作了详细的分域研究,涉及较多的古玺材料。

1986年,汤馥惠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考释了古玺中的一些疑难字,并且对《古玺汇编》所收的楚、齐、燕三国玺印作了新的释文和初步分类。许学仁博士论文《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》,也涉及古玺分域。

1992年,董珊《战国古玺文字分国偏旁表谱》对古玺文字的偏旁进行了分域整理。

1996年邵磊《战国古玺分域丛谈》简要说明了齐、三晋、燕、楚、巴蜀、

秦等六系古玺的形制、语辞等，文后附有《战国古玺辨伪例证》。

2001年，庄新兴编《战国玺印分域编》出版。此书将三千余方古玺分为燕、齐、楚、晋、秦五系，并有释文。书前有《战国玺印分域考》一文，详细分析了各系古玺的地域性。书后附有《战国玺文常见特色部首和字分域表》，按系别列有“人”“女”“马”“都”等三十个部首和字的形体。惜该书所收材料不多，释文和分域也多有可商。

2009年，陈光田《战国玺印分域研究》讨论了古玺地域特点和分域标准，并在分域的基础上对大量古玺作有简要的释读。

2010年，萧毅《古玺文字“夂”的地域特征》探讨了“夂”的地域特征以及一些玺印的地域归属。

2012年，刘建峰博士论文《战国玺印文字构型分域研究》对古玺文字构形进行了分域研究。

楚玺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。汤馥惠《楚器铭文八考》和《楚玺两考》、李家浩《楚国官印考释（四篇）》、刘钊《楚玺考释（六篇）》、林清源《楚国官玺考释（五篇）》、施谢捷《释战国楚玺中的“登徒”复姓》、何琳仪《楚官玺杂识》、徐在国《楚国玺印中的两个地名》、萧毅《合玺“敬玺”考》等文考释了一些楚玺，韩自强、韩朝《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国官玺》介绍并考证了几方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官玺。郑超《楚国官玺考述》、牛济普《楚系官玺例举》、萧毅《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》等文整理了楚官玺。黄锡全《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》涉及较多的楚玺。1998年，罗运环《论楚玺及其他》对楚玺的起源、内容、特点、功能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。2002年，文炳淳博士论文《战国楚玺文字研究》对楚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，文中除汇释官署玺、官名玺、私玺外，还论述了楚玺的判别依据、文字的构形特征等，全书共收官私玺印（包括烙印、封泥等）413方，并有图片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。2004年，陈松长《湖南古代玺印》中涉及较多楚玺。2005年，吴振武《朱家集楚器铭文辨析三则》在讨论特殊写法的“之”字时，论及“计官之玺”“坪夜大夫之玺”“士君子之信符”等三方楚玺。有些楚玺学者们关注较多，如真山战国墓出土的“上相邦玺”，曹锦炎、王人聪、李学勤、萧毅等都有文章讨论；如《珍秦斋藏印·战国篇》141号玺，就有吴振武、刘钊、萧毅、禩健聪等学者考释。

燕玺方面的成果也较多。1993年,董珊发表《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》,根据所考释的燕玺“禹都司工”反驳了“燕国始封于燕山,后来并蓟而居”的旧说,指出燕国初封就在蓟,而蓟的具体位置就是“约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”。1996年,吴振武《燕国铭刻中的“泉”字》释出了燕玺中的“泉”字;同年其《释双剑谿旧藏燕“外司圣端”玺》则考释了“司声”一职;1998年,其《燕国玺印中的“身”字》考释了燕玺中的“身”字。1998年,李家浩《燕国“洧谷山金鼎瑞”补释》考释出玺文“谷”字,并分析了其他一些从口的字。同年何琳仪、冯胜君合写的《燕玺简述》考证燕玺中的地名、官制、军制、市制等。2004年,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,赵平安《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“都”当为“郟”(县)字》探讨了旧释为“都”的字。2012年,张振谦《燕玺复姓“夷吾”考》认为旧释“率吴”的燕玺复姓应该是“彝(夷)吴(吾)”。

齐玺方面,1991年,葛英会《战国齐“徙毗”玺与“爰土易居”》研究了齐“徙毗”玺的释文及其性质。1996年,吴振武《齐官“王冢”考》就齐玺0312等的释读提出了新的观点。1998年,曾宪通《论齐国“遯盈之玺”及其相关问题》考释七方齐玺。2004年,赵平安《战国文字中的盐及相关资料研究》涉及《古玺汇编》0198等多方齐玺,认为其中释读分歧较大的那个词是“徙盐”,“徙盐就是运盐”,“很可能是官名”。2012年,吴振武发表《谈齐“左掌客亭”陶玺——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“亳”的字应是“亭”字》。2013年,程燕《齐官考释三则》考释了《古玺汇编》0197等三方齐玺。

专论三晋玺的文章不多,吴良宝《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》涉及较多的三晋官玺。2009年,吴砚君《三晋古玺杂说》讨论了三晋古玺的形制等,并发表了很多新资料。2014年,孟丽娟《三晋官玺集释》收集了较多资料,其中有些玺印的地域归属还可斟酌。

可见,对古玺的分域研究已渐趋细致,系统性也在加强,这是古玺研究的新特点。

5. 其他

语言文字方面,李家浩《从战国“忠信”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》是结合语言的研究,吴振武《古文字中的借笔字》涉及较多的古玺文字。曹